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第二个结合”中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新文艺

□黄力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对文艺界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基本问题域及其解决方向,即坚持“第二个结合”,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即“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文明成果。

文艺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发生及过程

“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出现,提出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形态追求,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

在中国文艺领域,所谓“古今中西之争”是指,在古代文艺与现代文艺、中国文艺与外国(特别是西方)文艺之间,一度存在谁新谁旧、谁优谁劣的问题。

本来,中国文艺独具优势——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规模、延续性的角度,还是从文艺审美本性的充分发扬与建树上,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星汉灿烂”之景,足以在世界文艺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他新近的著作中就说,自己曾相信,诗歌是英国人对世界文学最伟大的馈赠,但到访并了解中国后,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英国,有记载的诗歌创作史也远早于英国。一些具体数据,或许能进一步说明中国诗歌的非凡创造力和巨大数量。艾伦·麦克法兰说,自己也许可以说出50位英国诗人的名字,并知道其中大约10位生于何处,或在何处度过了他们的大半生。但有地图标记了中国诗人及其家乡,上面有唐代诗人2625人,宋代诗人2377人,明代诗人3005人,清代诗人2079人,要想了解过去1500年来的10000多名诗人的行踪,这是无法做到的。

与近代文化相吻合的是,文艺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明确发生,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反思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路最终指向文化,首当其冲者为文艺。《新青年》1917年第1期杂志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这“八事”的核心就是文学必须采用新的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抨击“吾国文言之背驰久矣”,实质上对传统中国文艺话语方式进行了根本性颠覆。然后,陈独秀也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由于这些主张迥异于传统文学,于是出现了新文学、新文化的概念。然后,新文学、新文化的概念中加入了大量欧洲文化与文学的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古今中西之争”。

新文化运动不只是见于理论,还发生于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实践。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被称为文学革命的“实绩”,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文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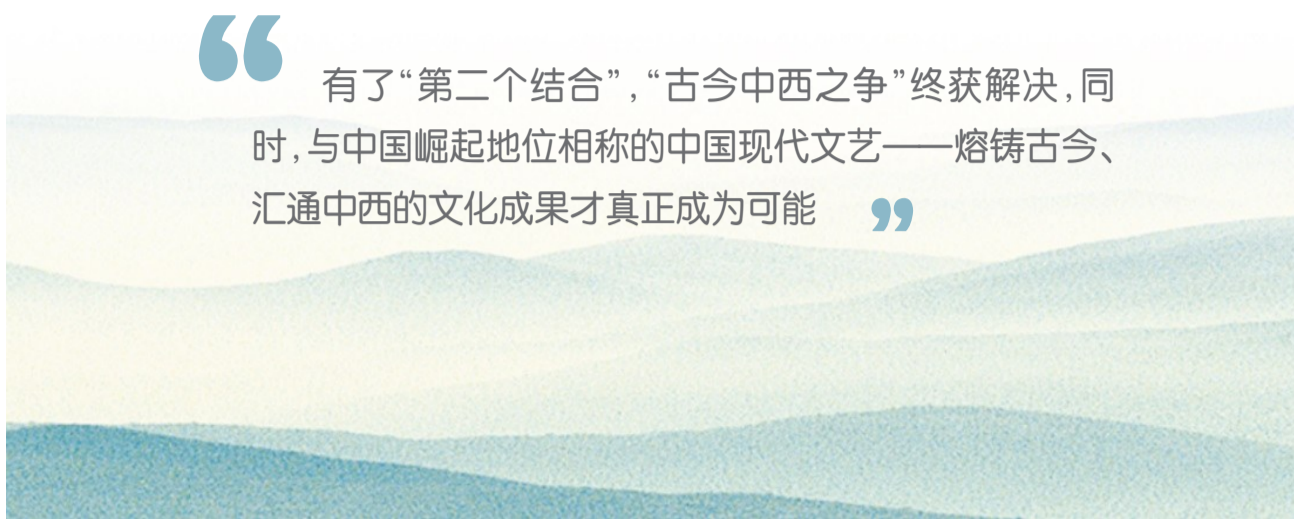
应该说,如此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积极意义是反省了中国传统文艺的固步自封的倾向,提出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形态追求,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期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启发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突出特征,认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为增强文化自信自强、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凝结着古代圣贤的思想精华,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可化育心灵、陶冶情怀,使精神充满理想憧憬,为生活增添美的感受。在当前,它更是作为思政资源进入校园、深入社会各界,成为滋养人民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的文化之源,成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蕴含顽强拼搏、激流勇进等意志的《行路难》,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感的《红岩》,对农业发展问题有深刻思考的《创业史》等文学作品,以音频、视频、图片等形式进入思政课堂。故以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为契机,以新的教学理念、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于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领悟能力和感知能力,激发广大受众探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继而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学审美有利于激发人们崇德向善

作家们将自己对个人与时代、历史和现实,以及对人民群众丰富内心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充分表达出来,进而创造出与时代、社会相适应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既为世界文学留下中国文学的鲜明刻度和灿烂华章,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了真善美。就文学的“真”而言,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更是情感、事理的真实。唐时宋词或以豪迈、或婉约、或悲悯、



中国的是旧的,旧的是不好的;外国的是新的,新的是好的。对中国文化过度失去信心,以胡适之论为极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由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功,1949年以后西方势力退出中国。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一度有所收敛。当然,这里还横插入了1950年代苏联文化艺术对中国的影响问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处不赘。

19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客观上,西方文化与文艺的影响又再度进入中国,于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再度抬头,某些激进人物步胡适之后尘,提出:“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一时间,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

在中国追赶世界的过程中,出现这些观念并不奇怪,全球文化史都有此种现象的存在,但是,当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时,当中国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时,难道还可以容许“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存在吗?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断然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既拒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倾向,同时又坚定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拒绝简单的复古主义

我们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国的崛起当然是其重要的历史平台,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走向世界都不可能脱离其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基本判断。而从思想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方法来说,那就是我们有了“第二个结合”这个思想武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应对接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否则就会发生教条主义的错误;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主要意义,乃在于开创一种崭新的中国思想话语——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让文学经典为思政教育赋能

□张海峰

或庄重的词汇传递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情感。带有鲜明历史性的红色文学经典,为世人生动描绘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革命和奋斗史。就文学的“善”而言,彰显了人性的光辉,是抑恶扬善的价值体现,如“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闪现的傲岸不屈、奋发自励的人格力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传递的正直刚强的品质。就文学的“美”而言,是语言美、情感美、意蕴美,是形式美、内容美,是审美价值的体现。例如,诗歌的節奏美、韵律美,戏剧、小说的情节曲折之美、用词之美,拨动人的心弦。

正是中国文学所蕴含与传递的真善美,赋予其丰富的思政教育价值。一方面,文学作品蕴含隽永的审美教育价值。审美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蕴含真善美的追求,是思想道德情操教育的活教材,具有极强的艺术感召力,亦呈现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美学意蕴。将文学作品融入思政教育系统,可让受教育者在审美化的情境创造、浓烈的感情氛围中受到隐性教育。换言之,这种在文学欣赏过程中,从情感出发的审美,更能发挥让人崇德向善的作用。如沈从文的《边城》既是对淳朴自然田园文明的赞颂,也始终贯穿着作者对人情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中,对小英子和明海纯真爱情的动人描述,既呈现爱情的动人之美,也充分展示了桃花源世界的人性之美。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蕴含深刻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理想信念是人们进行行为选择的依据和动力。理想信念教育关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以民族大义、兴衰盛亡、家国天下等为书写对象的中国文学,蕴含着对仁政的呼吁与渴求、对人民情怀与家国情怀的张扬,对黑暗统治的批判,对违反社会准则的人的谴责……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表征,可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滋养。例如,蕴含追求真理、九死无悔、永不屈服

前面已述,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古今中西之争”成为一个突显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时间一直停留在新文化运动,这个问题不会自行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是中国相对落后是客观的,发展起来有待时日;另一方面,西方文化艺术对几乎凝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新鲜性尚能再持续许久。也就是说,还会有很多人坚持“中与古”不及“西与今”的观点。但是,历史自有其规律,就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疮疤被揭开,露其丑陋;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来自欧洲的思想进入中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揭露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弊端,但它又积淀着欧洲思想的精华——从古希腊传统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那些一度热衷于一般欧洲思想的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于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而中国现代文化史,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站在21世纪的历史平台上,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要从两个结合主体因素说起。我们要破除一切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思想障碍,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两个结合”主体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只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试图简单恢复传统命题及其话语形式,抹除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痕迹。这就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了,而是单方面的复古主义意图。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简单的复古主义显然是有悖于思想解放的。

我们必须注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处处强调的是现代化和创新,如“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我们当然不能消灭古老文明,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也不能发生文明断裂,但是,其目的全在于现代化。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个历史性问题时,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位学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乃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立场的,拯救了被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内含了现代化的思想,让我们思索如何推动暂时落后的民族走向现代化——要走向现代化就要对沉重的文化传统进行革故鼎新。

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深刻地进行了一个对比: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高度文化”;而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度文化”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不知要高出几多倍”。毛泽东的论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特殊地位。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既拒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倾向,同时又坚定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拒绝简单的复古主义。

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文艺的新创造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方向和路径何在呢?“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文学艺术而言,中国的传统文艺在时间上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形态性质上璀璨华丽、光彩夺目,加以挖掘、继承并发扬必定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会不断刷新全世界的文化眼界。一种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文艺也是文化史的呼唤。即使如毛泽东这样深谙中国传统之精髓的文化大师,亦认为,“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以中国诗词而论,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古典诗词穿越时空之后的独特华章。但他也并不因此过高评价诗词创作。1950年代,毛泽东几次谈及,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律、格律,很不容易学,也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因而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文学史上,明代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一批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本身就反映出传统文艺已形成自己的惰性,需要进行现代化的革新。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方向和路径何在呢?“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一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领悟中华美学思想的同时,断然拒绝“全盘西化”的幼稚行为——毛泽东就理性认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另一方面,拒绝“全盘西化”不等于不需要学习吸收欧美现代文艺创作风格与表现形式,更不等于不需要文艺的现代化。文艺界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个结合”的主体因素的审美意义认识。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吸收域外艺术的安全通道: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消极面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经验和美学思想集中了19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美学的精华。就马克思个人来说,他对古希腊神话艺术魅力的称颂,对中世纪宗教式的愚昧文化控制的批判,对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状态的向往,对文艺复兴典范作家作品(特别如莎士比亚)及启蒙主义精神的高度评价,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体现的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肯定等等,都足以为中国传统文艺加入科学理性的视野和新鲜的营养。马克思最伟大的基本审美理念——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有利于改革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之审美局限(这只是总体而言,韩柳欧苏等大家是注意到审美性的),又足以去质疑西方文艺中的现代主义的“直觉即表现即艺术”观以及后现代主义中种种儿戏之风。特别是,马克思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时期,敏锐地预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这是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所必须跟进的。

有了“第二个结合”,“古今中西之争”终获解决,同时,与中国崛起地位相称的中国现代文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才真正成为可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当然,也可借用一些鞭答假丑恶的文学作品,向受教育者进行反向教育,引导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辨辨学习,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基于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加强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依托具有多样性、共享性、有效性等特征的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多媒体、虚拟技术等技术与媒介,通过数字采集、复原再现、展示传播等手段,促进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数字化变革,为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融合探索更多可能性。一方面,利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平台引导学生整合和传播文学作品,让其在学习与学习作品的过程中,汲取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从而达到思政育人与文化育人的目标。另一方面,借助VR、AR等数字化手段,为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构建好相应情境,让其沉浸式体验中接触更加直观、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作品人物、曲折情节、动人情感,自觉建构起主体文化与价值观念互联互通的情感链条。

坚守育人主阵地,在文学人物扮演中提升思政育人成效。思政课作为思政教育的主阵地,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的成效。将文学作品融入课堂教学,以此打造特色鲜明、教学资源丰富的思政课堂,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例如,思政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与要求,在课堂合理引入文学作品,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强化学生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激发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例如,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一课程,思政教师可组织学生扮演白金《家》中精神空虚、封建思想浓厚的高老太爷,激进、大胆却又幼稚、单纯的知识分子觉慧,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觉新,聪明、美丽、善良却被迫投湖的鸣凤,郁郁致死的梅等,让其角色扮演与实际情景中认识封建社会的压迫、人性的美与恶,以及五四青年意识觉醒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要积极推动学生阅读并排演那些红色经典,让学生们在不自觉之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承担起传播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教师,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多元化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时空演化、风险画像与应对研究”(编号2022N90)阶段性成果]